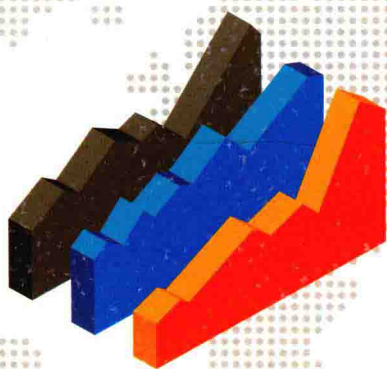


复苏向好的 世界经济

新格局、新动力与新风险

2018年世界经济
分析报告

REPORT OF
WORLD
ECONOMY



2018

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
宏观经济分析组

权衡 等 / 著

格致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

复苏向好的 世界经济

新格局、新动力与新风险

2018年世界经济
分析报告

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
宏观经济分析组

权衡 盛垒 等 /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复苏向好的世界经济:新格局、新动力与新风险:
2018年世界经济分析报告/权衡等著. —上海:格致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4
ISBN 978-7-5432-2856-6

I. ①复… II. ①权… III. ①世界经济-研究报告-
2018 IV. ①F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61169 号

责任编辑 忻雁翔

装帧设计 人马艺术设计·储平

复苏向好的世界经济:新格局、新动力与新风险

——2018年世界经济分析报告

权衡 等著

出 版 格致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发 行 上海人民出版社发行中心
印 刷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15.25
插 页 3
字 数 250,000
版 次 2018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432-2856-6/F·1102
定 价 80.00 元



目 录

导 论 / 1

- 0.1 世界经济增长:结构性困境、逆全球化思潮与发展新周期 / 2
- 0.2 经济全球化发展:实践困境与理论反思 / 16
- 0.3 本书的主要结论 / 32

第1章 2017年世界经济回顾 / 36

- 1.1 2017年世界经济的新亮点 / 36
- 1.2 2017年世界经济的主要问题 / 45

第2章 影响2018年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 / 51

- 2.1 地缘政治失衡加剧世界经济复苏风险 / 51
- 2.2 美国加息缩表造成世界经济增长不确定性 / 52
- 2.3 美国减税政策带来世界经济增长新格局 / 55
- 2.4 贸易增长不可持续性构成世界经济新难题 / 57
- 2.5 人工智能迅猛发展或重塑全球产业经济新结构 / 59
- 2.6 “一带一路”倡议落地深耕为世界经济注入新动能 / 61

第3章 2018年世界经济发展新趋势 / 64

- 3.1 世界经济:复苏势头仍将持续,但向好基础尚不稳固 / 64
- 3.2 国际金融:全球货币政策收紧,金融动荡概率不减 / 79

3.3 世界贸易:全球贸易或将恢复增长,短期维持低速 / 83

3.4 全球投资:活跃度有望提升,“一带一路”贡献增强 / 86

第4章 中国经济:新时代开启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 88

4.1 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取得重大成就 / 89

4.2 需求端:投资消费增速下滑,贸易回暖支撑经济 / 94

4.3 供给端:过剩产能不断出清,生产效率稳步提升 / 98

4.4 新时代中国经济的新风险与新动力 / 101

第5章 “三大变革”引领世界经济迈向发展新周期 / 105

5.1 世界经济真正有效复苏亟待新周期之变 / 105

5.2 新科技革命重塑世界经济增长新动力 / 107

5.3 “一带一路”建设重塑全球化发展新格局 / 120

5.4 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有助于构建 21 世纪世界经济发展的新规则 / 128

5.5 进入发展新时代的中国有助于推动世界经济走向新周期 / 139

第6章 持续复苏的美国经济:货币政策常态化及税改落地 / 144

6.1 美国宏观经济形势持续向好 / 144

6.2 特朗普新政:缩表、加息与减税及其影响 / 146

6.3 从退出 TPP 到“印太战略”:美国的新亚洲战略及其影响 / 149

6.4 中美经贸关系新动向:寻求共赢,摒除零和 / 152

附录 美国税改法案及经验回顾 / 153

第7章 欧盟经济:复苏增长的特点及大选后的政策走向 / 157

7.1 2017 年欧盟经济持续快速增长 / 157

7.2 大选后的经济政策走向及脱欧谈判进展 / 163

7.3 欧盟对外经贸关系出现新变化 / 167

7.4 欧盟一体化发展长期趋势不改 / 170

第8章 复苏中的日韩经济:对华关系改善迎来发展新机遇 / 172

8.1 日本经济持续扩张 / 172

8.2 日本经济中长期发展面临挑战 / 175

8.3 中日关系改善迎来新机遇 / 178

8.4 韩国经济回暖复苏 / 179

8.5 中日韩自贸协定与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展望 / 184

第9章 东盟经济:在变革与创新中同中国经济共同发展 / 186

9.1 东盟经济:50年发展奇迹,前景继续向好 / 186

9.2 中国—东盟经济:人文交流新支柱,创新合作新动能 / 192

9.3 RCEP:沉闷中凸显光明,坚决务实力争达成 / 196

第10章 印度经济:改革持续推进与经济高位波动 / 199

10.1 “莫迪新政”初显成效 / 200

10.2 印度经济持续保持高位增长 / 205

10.3 印度经济虽面临挑战但前景广阔 / 208

10.4 中印经贸合作在波折中前行 / 210

第11章 中国—中东欧合作:从开放融合到务实合作 / 214

11.1 中国—中东欧合作:广度延展,深度加强 / 214

11.2 中国—中东欧合作:前景广阔,行稳致远 / 222

11.3 中国—中东欧合作:深化合作,做好保障 / 223

主要参考文献 / 225

后记 / 233

导 论

回望金融危机十年,肇始于美国的那场危机十分深刻地改变了世界经济发展格局:危机阴霾十年,一方面,全球经济遭受重创,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全球化浪潮遭遇挫折,全球治理体系面临挑战,国际经济秩序加速变革;另一方面,新一轮科技革命正在孕育,实体经济发展重新审视,全球结构性改革不断加快,世界经济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和大转型的时期。

十年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面临着内部断层和社会撕裂的困扰,“历史的火炬似乎正从西方传给东方”。在这场全球金融动荡中,似乎正在给人一种“西方在衰退,东方在增长;西方充满担忧,东方满怀希望”的印象。显然,危机十年之变,使西方模式逐步走下“唯一正确”“一统天下”神坛,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正在出现群体性崛起,迈向新时代的中国也正在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这种“制度统治”的动摇,加速着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革命性转进。

走过“新平庸”的危机十年,世界经济似乎渐次摆脱危机阴霾,迎来了一波比较强劲的反弹与增长,呈现出不少不同以往的新亮点、新特征和新趋势。但令人担忧的是,在逆全球化思潮和贸易保护主义暗流涌动的背景下,当前世界经济出现的强劲复苏是否可持续?这种复苏的本质究竟是一种恢复性增长还是内生性增长?抑或仅是一种“价格现象”?进一步看,世界经济是否进入了一个复苏换挡的拐点,能否由此实现从“脆弱慢增长”向“稳健快发展”的长期状态转换?如何才能更有效推动全球经济进入新一轮的发展长周期?这些都值得我们进一步地深入总结和思考。

0.1 世界经济增长：结构性困境、逆全球化思潮与发展新周期

2008 年以来，世界经济目前总体上依旧处在危机后的缓慢复苏过程中。本轮危机后的复苏与以往最大的不同，在于危机后的复苏时间长达 10 年，至今仍未真正走出危机，复苏和增长步履维艰，且危机后复苏的不确定性因素日益增多，不仅出现全球增长持续低迷，而且贸易增速出现下降，政策协调难度加大，全球经济增长表现“平庸不断”；不仅如此，各种所谓影响世界经济发展的“黑天鹅事件”不断上演，欧洲经济、美国经济、日本经济以及新兴市场经济体增长不确定性增多，金融市场、汇率波动等也不断加大，逆全球化思潮兴起，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对于 2008 年以来的世界经济增长，应当深入分析世界经济增长面临的问题、出现的悖论及其成因、深层次机理及其未来出路，这对理解世界经济结构性调整和长期增长具有重要作用。^①

0.1.1 世界经济发展正在陷入增长悖论

危机发生以来，世界各国都采取了逆周期调整的宏观经济政策，试图运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等积极应对危机，刺激经济增长，实现经济复苏。总体而言，世界经济在漫长的复苏中，尽管存在许多不确定性，但是也出现了以下三个显著特点：

一是复苏增长出现明显分化，突出表现为发达经济和发展中经济体内部明显分化。在发达经济内部，除了美国等出现积极复苏的信号之外，欧洲、日本等经济增长总体仍然低迷；在欧洲内部，经济复苏也出现了分化，除了德国经济复苏较为积极，其他欧洲经济体内部复苏同样缓慢。发展中经济和新兴市场内部也出现明显分化，除了印度、中国等经济增长进入中高速和新常态以外，俄罗斯、巴西、土耳其以及东南亚等经济复苏依旧缓慢。由于全球经济复苏增长出现分化，全球性政策协调和“集体行动”难度加大，美国等少数发达国家已经退出量宽政策，货币政策逐渐进入常规性轨道；但欧洲央行、日本等国家则继续实行量宽，甚至出现负利率货币政策。这样的背景下，全球宏观政策协调缺乏一致性和集体行动的动力，宏观政策的分化在客观上也不利于全球经济的整体

^① 本部分内容具体参见权衡：《世界经济的结构性困境与发展新周期及中国的新贡献》，《世界经济研究》2016 年第 12 期。

复苏,反而加大了复苏增长的不确定性。

二是全球经济复苏与增长似乎正在出现“低增长循环陷阱”的特征。即在复苏增长过程中,由于持续低迷增长,导致世界经济从危机刚刚发生以后的“三低一高”即“低增长—低物价—低收入”和“高失业”逐渐演变成为“危机—衰退”引致的“低增长—低利率—低物价—低回报—低投资—低增长—低收入—低消费”的恶性循环;在这样的循环机制下,世界经济普遍出现了“低贸易增长”“低资本流动性”和“低物价”的“三低”现象。根据世界银行分析,世界经济除了2008年以后大规模刺激带来V字形的短期反弹,从2010年开始全球经济增长就进入持续低迷的状态,至今尚未恢复到2008年以前10年的平均4.5%的增长速度,目前大致维持在2.5%左右。不仅如此,作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引擎的全球贸易增速,也是连续四年出现下降,并低于全球经济增长平均速度,目前估计只有2%左右;与此同时,全球资本流动性趋缓,国际投资增长放慢,金融市场波动加大,美元加息进一步加剧了资本流动性的波动。

三是地缘政治因素、大国选举及其政策变动等深刻影响世界经济发展趋势乃至全球化新格局。恐怖主义、欧洲难民问题、俄罗斯地缘政治问题、英国脱欧乃至特朗普新政等都对全球经济发展、资本流动的安全性、能源市场、欧洲一体化以及美国的内政和外交政策产生深刻冲击,世界经济也因为这些经济、非经济因素和大国关系等问题更是增加了很多不确定性和复杂性,世界经济发展和全球化趋势更加扑朔迷离,令各方感到纠结和焦虑。

更为深层次的问题则是,世界经济在缓慢复苏和低迷增长的过程中,似乎更加清晰地显示出了一些“悖论”:

一是量宽的货币政策与持续低增长的悖论。危机发生以后,世界各国纷纷采取反危机的调节和刺激政策,普遍采用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从表0.1可以看出,世界主要国家广义货币占GDP的比重都保持了上升态势,其中全球平均占比从2007年的98.81%上升到2015年的124.07%,包括像美国先后实施四轮量宽政策、日本安倍经济学大规模量宽、欧洲央行实行零利率等。与此同时,全球以及欧洲、日本等国家的GDP复苏与增长并未出现明显上升,除了2009年大刺激大投资带来短暂的反弹以外,其余时间GDP增速基本上出现明显放慢。除了美国因为复苏较为强劲而退出量宽政策以外,其余主要经济体仍然保持量宽政策取向,有些国家甚至运用负利率手段刺激经济增长。

从经济学分析来说,短期内经济衰退和萧条,应该采用逆周期的宽松的货币政策进行刺激,推动经济走进复苏和新的一个繁荣周期。但是,目前的世界经济增长与宽松货币政策正在出现背离,即一方面主要经济体实施量宽货币政策,另一方面 GDP 增长却仍然保持低迷和增速趋缓的态势,出现了“量宽货币政策与经济增长低速”的悖论。世界经济增长出现了与以往低利率引致高投资、宽松货币刺激引致经济增长所不同的新情况,利率水平不断降低,投资意愿却仍不断下降,传统凯恩斯主义政策范式似乎正在失效,这是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问题。

表 0.1 世界主要国家广义货币/GDP 及 GDP 增长率(%)

		2007 年	2008 年	2009 年	2010 年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全 球	广义货币/GDP	98.81	102.77	114.10	110.89	112.37	115.14	115.98	118.74	124.70
	GDP 增长速度	4.31	1.84	-1.68	4.35	3.13	2.48	2.40	2.63	2.47
中 国	广义货币/GDP	150.53	150.01	176.55	177.51	175.90	182.38	188.18	193.17	205.74
	GDP 增长速度	14.19	9.62	9.23	10.63	9.48	7.75	7.68	7.27	6.90
英 国	广义货币/GDP	144.69	166.49	170.17	169.02	155.17	152.07	149.03	138.67	137.82
	GDP 增长速度	2.59	-0.47	-4.19	1.54	1.97	1.18	2.16	2.85	2.33
印 度	广义货币/GDP	71.00	75.78	77.72	76.19	78.84	76.86	77.91	77.77	79.19
	GDP 增长速度	8.61	3.89	8.48	10.26	6.64	5.62	6.64	7.24	7.57
日 本	广义货币/GDP	202.81	209.08	227.02	225.46	237.43	240.70	247.18	250.48	251.92
	GDP 增长速度	2.19	-1.04	-5.53	4.71	-0.45	1.74	1.36	-0.03	0.47
俄罗斯	广义货币/GDP	42.82	39.43	49.21	51.38	48.17	48.15	52.48	55.21	63.76
	GDP 增长速度	8.54	5.25	-7.82	4.50	4.26	3.52	1.28	0.71	-3.73
美 国	广义货币/GDP	79.46	84.55	91.06	85.33	87.78	88.45	89.50	90.33	90.32
	GDP 增长速度	1.78	-0.29	-2.78	2.53	1.60	2.22	1.49	2.43	2.43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http://data.worldbank.org.cn>)。

二是全球高债务与低消费的悖论。一方面,危机以来全球债务水平不断高企;另一方面,消费水平稳中趋缓、贸易增长出现下降。2008 年危机发生以来,全球债务水平特别是发达国家从危机前的 72% 上升到 104%,英国从 44% 上升到 89%,美国从 64% 上升到 105%,日本从 147% 上升到 248%。需要指出的是,发达经济体的债务性质与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的债务性质不太一样,前者的债务水平更多用于养老等社会支出和促进消费水平上,发达国家主要表现为“高债务—高消费”模式。但是,危机发生以

来,这种不断高企的债务水平并没有提升家庭消费水平,各国内需稳中有降,由此导致全球进口需求增长乏力。2012—2013 年全球贸易量增速连续两年低于经济增速,这与国际金融危机前 5 年贸易量快于 GDP 增速 1 倍形成强烈反差。因此,世界经济进入了低利率背景下的高债务和低需求、低贸易增长并存的悖论。过去几十年来,全球经济特别是发达经济普遍是“高债务—高消费”,全球贸易高增长的确是世界经济的引擎,但目前的世界经济似乎在背离这个常态,进入了高债务和低消费、低贸易的“非常态”。这同样是值得我们思考的一个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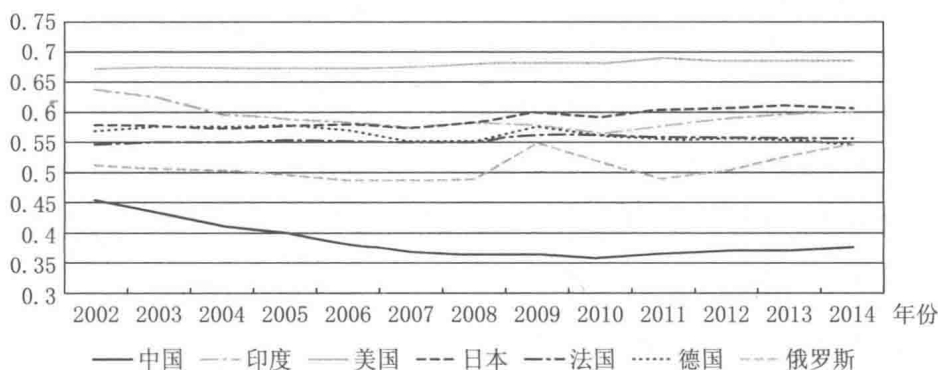


图 0.1 世界主要国家的家庭消费支出占 GDP 比重

资料来源:联合国贸易与发展组织数据库(<http://unctadstat.unctad.org/>)。

三是科技、自动化创新与充分就业的悖论。危机发生以后,全球经济增长期待科技创新和新产业革命。毫无疑问,科技创新和技术进步是新一轮世界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尤其在当前世界经济持续低迷的背景下,各国都希望创新世界经济增长方式,提升全球经济增长的全要素生产率,降低生产成本。但是,目前的技术创新似乎更加强调智能化、自动化的新趋势,如德国提出的“智能制造”“自动化”“工业机器人”等;尤其是互联网时代确实正在改造传统的工业化流程和服务经济模式,全球技术进步出现了快速的“劳动节约型”的技术创新和发展方向。在这样的背景下,全球实体经济发展与就业增长的关系便成为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即如何缓解危机以来实体经济下降、失业率上升和就业增长的压力和困难。传统宏观经济学研究表明,各类宏观政策调控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实现充分就业,也即被视为政府制定政策、发展经济的主要目标之一。但是,自动化、智能化的技术创新正在深刻影响产业结构、经济增长模式和就业方式。世

界经济似乎走在了一个充分就业与技术创新发展的十字路口。因为无论如何，技术创新尤其是劳动节约型技术创新客观上正在成为一种趋势，我们必须在自动化、智能制造与充分就业之间形成一个新的平衡。实际上，美国总统特朗普就是抓住“如何解决美国高失业率”这个问题，通过提出所谓让“制造业回归美国”等一系列主张而获得总统选举大胜的。但实际上，美国的高失业率既有金融危机冲击因素，更多则是由于技术进步、互联网、自动化、智能化等结果造成的，并非完全是因为制造业转移所致。人们面对充分就业与技术创新的选择，能否找到一个具有“中性”的技术进步呢？这同样是今天世界经济增长面对的一个新问题。

四是实体经济“冷”与虚拟经济“热”的悖论。危机以来，全球经济发展进一步出现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脱离的趋势和问题。2008年危机发生的导火线就是虚拟经济过热，特别是金融创新脱离实体经济，金融领域发生危机并迅速扩大到全球；多年来世界经济增长中积累的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关系问题没有处理好，最终因为高杠杆、高债务和高风险而引起危机与衰退。危机发生以后，原本虚弱的实体经济更是雪上加霜，至今没有恢复到危机前的增长状态，实体经济投资成本上升，资本的投资意愿进一步下降，全球性资本流动和跨国投资速度放慢，各国实体经济普遍不景气。与此同时，虚拟经济则进一步脱离实体经济，走向自我循环，各国杠杆化程度进一步加深，特别是旨在刺激实体经济增长的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不仅没有随着降准降息而刺激实体经济的投资，反而却导致全球流动性过剩，使得虚拟经济更加过热，全球经济特别是发展中经济体一度出现短时期股市泡沫甚至股灾、房市过热和资产价格泡沫。经济学研究同样表明，金融是为实体经济服务的，宏观经济分析模型中的IS-LM模型总是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的，背后的逻辑则是利率—投资—需求—增长—就业—物价—收入等相互变量之间的作用机制。理论本身表明虚拟经济发展始终以实体经济发展为基础，但是目前的世界经济发展却出现了实体经济“过冷”与虚拟经济“过热”的悖论。人们不禁要思考，全球经济的金融化意味着什么，金融化与全球化交织发展无疑增加了我们对全球经济分析的难度。

五是全球化与逆全球化的悖论。金融危机发生以来，人们确实也在反思许多问题，其中最大的反思和争议莫过于对全球化机制的思考。特别是局部国家发生的金融危机因为全球化使得许多国家被卷入，遭受全球性金融危机的打击和影响。但是，人们也始

终坚信地认为,全球化作为全球范围内的市场化配置资源的机制,仍然是发展大势所趋,是人心所向,是历史潮流,无论是全球化的倡导者,还是全球化的参与者,都分享了全球化发展带来的巨大红利。但近两年来,由于全球经济衰退和缓慢复苏,贸易增速下降,各国纷纷竞相扩大出口,保护进口,贸易保护主义势力纷纷抬头。一般而言,危机时代,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是“常态性”选择,况且自由贸易与贸易保护主义的争论从来都存在。但问题是,最近全球经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其影响和意义远远超过了传统贸易保护主义:其一,英国脱欧对欧洲经济乃至世界经济的深刻影响。作为在欧洲复杂的地缘政治关系问题的产物,英国脱欧本身是对欧洲经济一体化和全球化发展的沉重打击,是一种典型的逆全球化现象和态势。其二,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及其政策主张。人们热衷于美国新当选总统,显然在于“特朗普新政”中流露甚至包含的一股反全球化、逆全球化甚至反经济学逻辑的思潮。这种思潮背后隐含着一种令人忧虑的民粹主义、极端保护主义倾向,这与全球化趋势、开放发展与自由贸易相向而行。目前“反全球化”“全球化终结论”等似乎掷地有声。显然,世界经济走到了全球化的十字路口,一方面是由市场化力量主导的全球市场机制配置资源,进而形成全球资本流动、全球自由贸易、深化全球分工和比较优势与合作发展的全球化趋势,另一方面也确实出现了民粹主义倾向的反全球化、逆全球化的现象。无论如何,逆全球化现象既不符合世界经济发展的需要,也不符合经济学的逻辑。全球化从来都有积极和消极的两面性,当前背景下全球化的困局,其原因不在于全球化发展的本身,而是由于世界经济复苏缓慢、甚至长期衰退引发的一系列问题和矛盾,且因为全球化机制使得这些问题和矛盾进一步放大所致。显然,逆全球化思潮已经困扰了世界经济发展,这值得我们进一步反思。

0.1.2 悖论之谜:世界经济增长中的结构性困境

如何理解和思考目前世界经济发展的困境?从现有的讨论来看,一种观点认为,由于2008年金融危机的冲击,导致全球性产出下降,消费下降,进而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下跌,总体世界经济增长进入通缩和停滞状态。这种观点在危机刚刚发生以后几乎占据主流认识。但是,问题在于从应对危机的反周期政策效果来说,目前全球经济衰退甚至“长期停滞”的背后,可能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和机理。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世界经济在全球化推动下走向了一个新的阶段,全球化机制需要反思和完善,特别是需要从完善全球

经济治理机制出发寻找世界经济解困之谜。第三种看法则是在最近两年人们逐渐形成的一个较为主流的看法和判断，即全球经济增长出现了结构性困境，所以加快推进结构性改革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的初步共识之一。这一点也在 2016 年 G20 峰会达成的共识中可以得到证明。但是，需要进一步思考的一个关键是性问题是，何为全球经济的结构性困境？制约全球经济平衡发展的最为根本的结构性问题和矛盾是哪些？为什么世界经济在这个阶段出现了结构性困境？这些困境和世界经济发展的周期性规律有何关系？思考和理解这些问题，对于理解世界经济中长期发展趋势、选择合适的全球经济治理政策具有现实意义。

我们的判断是，进入全球化发展新阶段的世界经济，结构性困境的确成为影响和制约全球经济复苏增长的根本性问题。具体有如下几个结构性困境：

一是全球产能过剩困境和总量失衡制约了复苏与增长。世界经济在上一轮科技革命、技术创新和全球化发展的推动下，全球技术效率驱动和全球资源配置，极大地提高了世界经济的生产效率，尤其是快速工业化和制造业发展提高了全球性的产能水平；与此同时，随着产业结构升级转型以及服务经济发展的兴起，全球对制造业产能需求下降，全球范围内出现了严重的供求总量失衡和全球产能过剩的问题。这个问题实际上在金融危机发生以前就已经出现，只是危机的冲击进一步造成需求收缩，产能过剩问题更加严重，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和行业发展严重亏损。而在这之后，各国采取的旨在刺激经济增长的量化宽松政策，实施的结果则是导致了更加严重的产能过剩。尤其是在新兴市场国家内部由于市场机制不完善，大量的货币宽松政策也导致了严重的资源错配和效率扭曲问题。而如何缓解目前的供需总量失衡，缓解全球性产能过剩，提高全球资源配置效率，则是一个亟待全球性合作与集体行动来推动结构性改革的问题。否则，仅仅依靠政策并把重点放在应对危机上，只能使总量失衡问题更加严重，长期内经济增长更加低迷。

二是新兴市场经济体供需结构不匹配加剧了世界经济结构性困境。在过去几十年的发展中，世界经济除了发达国家强劲增长的引领以外，发展中国家高速增长也是世界经济维持高增长的重要动力。但是，发展中经济体在经历了 20 多年的高速增长以后，也已经进入了结构性改革和调整的新阶段。特别是随着经济总量发展和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全球消费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和转型，全球范围内“恩格尔系数”趋于下降，

消费结构升级转型,对服务型经济的需求不断提高,高品质、个性化、服务化的消费需求正在成为主流。但是在全球范围内,特别是新兴市场经济体的旧的供给函数、生产模式与新的需求函数、需求结构不匹配。供需结构性不匹配严重制约了世界经济的新增长和新创新。所以,从全球经济供求关系来看,目前不仅供求总量上出现困境,而且在供求结构上也出现了困境;供需总量失衡与结构性失衡相互影响、相互强化,使得总体性结构困境和矛盾更加突出。全球经济发展中,供给端出现了深层次的结构性困境和问题。

三是全球发展结构不平衡与收入不平等的困境制约了增长和复苏。全球性消费增长低迷,不仅是因为金融危机冲击所致,更重要是的由于近几十年来全球经济发展中收入不平等现象日益加剧。根据皮凯蒂在其《21 世纪资本论》中的论述,包括欧洲、美国等几乎所有发达经济体在内,近几十年来全球经济增长中资本回报率一直大于经济增长率即所谓的 $R > G$ 的规律。正是在他所谓的这个“规律”作用下,全球经济普遍出现了不平等上升,世界主要经济体以收入或消费计算的基尼系数出现持续上升。在金融危机发生以后,世界经济普遍出现低迷增长的态势下,收入差距更加分化,许多国家中产阶层比重减少,经济和社会结构由此发生深刻变化。不仅收入分配是如此,全球财富分配和不平等也是更加分化,根据瑞信研究院(CreditSuisse Research Institute)2016 年 11 月 22 日发布的《2016 年全球财富报告》,全球范围内底层广大群体(总人口的 73%)总共拥有全球财富的 2.4%,但最富有的十分位数(成人的前 10%)拥有全球资产的 86%。由此可见,财富差距愈演愈烈。即使在经济呈现快速增长的新兴市场国家,例如中国、印度等,经济高速增长中同样也是伴随着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俄罗斯、巴西、拉丁美洲等经济转型过程中,收入和差距也出现不断扩大。全球不平等加剧,直接的后果之一就是大多数中低收入群体的低消费增长,进而制约经济增长,也必然影响全球化发展进程和全球贸易发展。全球性的收入和财富不平等上升,导致了世界经济的需求端发生了问题,消费对世界经济的拉动力正在减弱。

四是全球经济面临人口结构转变与老龄化困境。进入 21 世纪以来,世界经济发展中另一个最大的结构性改变是全球人口结构的转型与变化。总的发展趋势就是老龄化人口比重不断上升,世界经济普遍进入了老龄化时代。按照国际惯例,65 岁及以上就算是老年人,2012 年全球老年人口占比为 8%,至 2015 年这一比例就上升为 8.5%。而

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公布的《老龄化世界：2015 报告》，2015 年全球已经有 6.17 亿人口年龄在 65 岁以上，到 2050 年全球将有 16 亿老年人口。届时将有 94 个国家和地区的老龄化人口占比超过 21%，其中有 39 个国家和地区的老龄化比例达 28% 以上。根据该报告分析，一方面大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婴儿潮”时期出生的人口，现在正好步入老年；另一方面欧洲保持历史传统，早早进入老龄化至今没有走出，而亚洲与拉美近年成为老龄化“后起之秀”，老龄人群在快速增长。根据发展经济学人口转折理论分析，后工业化时代人口增长会进入“低生育率、低死亡率”的“转折”阶段，许多发达国家人口增长的这一变化，会从根本上影响经济增长。首先，老龄化意味着经济增长中的劳动参与率下降，进而直接导致劳动生产率下降；其次，老龄化和人口增长下降导致储蓄水平降低，进而影响投资增长；第三，老龄化也会导致消费水平下降，进而影响经济增长。因此，世界人口的长期变化在近几年开始出现“转折”即老龄化和少子化趋势，这种转折会从根本上改变全球劳动参与率、储蓄率和消费率，影响世界经济增长的生产函数，对全球经济长期发展带来深刻影响。在上一轮世界经济快速增长过程中，人口因素总体上还是积极的变量，甚至是影响经济增长的慢变量；但是，在未来的世界经济增长中，人口结构的变化和转折，则是影响世界经济增长和供给侧的重大因素。

五是全球经济治理结构陷入困境。危机发生以来，除了全球经济增速持续低迷、复苏艰难的问题之外，全球化何去何从也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焦点问题。从危机后普遍出现的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发展到英国脱欧导致欧洲一体化进程生变，再到令全球关注的美国总统选举过程中的“特朗普现象”等等，其中的很多现象和思潮，实际上已经触及了全球化与反全球化的问题。按照世界经济理论分析，作为建立在市场机制驱动和全球科技创新引领基础上的全球化机制，是全球经济发展中的重要资源配置机制，是世界经济创新、开放和发展的内在动力。但是危机以来，世界经济发展中出现了从贸易保护主义到民粹主义、反全球化逐步演变的思潮。从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动力和开放发展的规律来说，我们认为问题的实质不是全球化本身出了问题，而是在全球化发展到今天，世界经济格局发生根本性变化的大背景下，全球化进程中的治理机制和体系发生了严重问题。首先，全球经济治理的手段与治理的议题出现偏差。危机后的治理，重在货币刺激和复苏增长，而没有把治理目标放在如何消除和解决结构性过剩这一导致世界经济失衡的根本原因上。其次，全球经济治理的内在结构存在缺陷，并未真正把新兴市

场经济体的因素、作用、权利和诉求考虑进来,特别是忽视发展中国家在全球贸易、投资中的地位和作用,这就导致世界经济复苏更加分化和失衡。最后,全球经济治理机制无法应对和解决许多新的共性问题,如全球化进程中的不平等与减贫、技术与网络空间问题、资本流动性监管、货币政策协调等。^①也正因为这些问题,一方面造成逆全球化思潮兴起,另一方面也造成了全球经济发展的困境。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五大结构性困境是世界经济长期增长过程中逐渐出现的;也正是因为这些结构性困境,从根本上制约了世界经济复苏与增长,导致世界经济增长中出现了种种“悖论”。从长期增长来说,本轮经济复苏的实质并不在于促进经济增长上,而是需要真正推动全球性结构性改革,以新的结构性改革与创新发展,促进世界经济走向新的发展周期。

0.1.3 世界经济新周期与新出路:从斯密型增长迈向熊彼特式增长

世界经济增长是有周期性的。^②从长周期发展来说,当下的世界经济正处在一个新旧周期的转换期,即由于世界经济正在旧周期衰退、新周期孕育阶段,且不确定性日益增多,甚至全球化发展的方向也出现了动摇。但是,可以肯定的是,金融危机已经破坏了上一轮经济增长周期的内在动力,新的发展动力和周期尚未形成,目前的结构性困境使得世界经济正处在一个艰难的调整和新发展周期的形成过程中。

第一,世界经济需要从危机初期的再平衡走向新周期和新常态的转型与调整。危机发生以后,各国普遍开出了具有总量意义的“再平衡”政策范式,试图通过政策调整使得世界经济重新回到危机前的“平衡状态”;但事实表明,面对世界经济的结构性困境,世界经济已经无法实现再平衡;而是需要从再平衡的范式中跳出来,需要走向一个新周期和新常态的转型。再平衡本质上还是在原有的结构基础上实现总量平衡,而新常态则是启动世界经济新一轮发展周期,这个新周期需要新的发展动力、新的发展结构和新的发展治理的支撑和重构。因此,目前的世界经济亟待从传统的再平衡走向新周期和新常态的转型与调整。

^① 参见权衡:《G20峰会召开在即,“中国方案”为何受关注》,《解放日报》2016年8月16日。

^② 每一个国别经济,可以根据不同国家发展情况和不同发展阶段,运用短周期甚至中周期等分析框架进行观察和思考。但是,观察世界经济发展比较合适的视角和理论工具应当是长周期分析框架。长周期分析框架容易从总体和长期内分析世界经济发展的重大变量和趋势。